

沧桑齐鲁

“赫赫炎炎，云我无所”

——山东古代旱灾记忆

□ 本报记者 李鹏飞



1927年冬，济南，正在领取食物的难民

1927年冬，济南，逃难难民儿童

1928年，齐鲁大学校园内的难民临时住所

我省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相关史籍中对干旱的记录也相对较多而连续。了解先人所经历的苦难与奋斗，鉴往知来，或许对“科学发展”能有更多的感受吧。

关于旱灾最早的文字记录

关于旱灾的明确记录，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目前从专著和媒体报道，共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前711年，关于水旱灾害的专著多引此说；二是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见于最近的媒体报道。

查阅《春秋》可以知道，公元前711年“秋，大水。”《山东主要自然灾害》将这一年定为“山东水旱灾害记录的开始”是确切的，但引为旱灾的开始，并不准确。

“从来旱蝗两相资”

现代的研究者，多将干旱分为四个层次：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农业干旱、社会经济干旱。前两者可以看成是自然现象，后两者是灾害。

帝王“舞雩”背后的真实

“雩”，金文中多作介词。西周时期开始变成祈雨的仪式，《周礼·春官》说：“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后来学者解释说：“吁嗟求雨之祭也”；也有解释作“远”的：春天雩祭望秋天的收获，确实用心够长远。时至今日，曲阜仍有“舞雩台”遗迹。

在技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旱灾可以应对的有效办法其实很少，加上天人感应的传统，所以，祈雨是常见的。远者如商汤，“素衣白车，禡于桑林”，并且以身为殉；现代学者更认为，燎祭起源于东部沿海地区。商汤祈雨，“已而雨大至。”周秉德而兴，更是以雩为常祭，干旱时更耍“大雩”、“又雩”。民间则拜“龙”、“龙王”。

“从来旱蝗两相资”

从历史上看，山东既是农业较早发展的地区，又因为处于暖温带季风区，降水一直偏少。竺可桢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表明，如果以灾害高发区为标准分析的话，从公元前到东汉时期，旱灾高发区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这也是冀朝鼎先生指出的“基本经济区”。

“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

灾难史就是血泪史！我们今天在感叹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伟大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这“伟大”的基石是亿万百姓的牺牲。旱灾不过是这些牺牲的一个侧面，而今天在回顾这些灾难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祸？

记者在整理关于灾荒资料的时候，既感慨于先民艰苦卓绝、与天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中，有多少是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征服自然得来的？更多的研究表明，历史愈往后，旱灾的频率越高，烈度越大。唐宋以后，随时间推移和农业扩展，过度开发，生态逐渐失衡而呈加快、加剧的趋势。

饥荒、疫病等灾难下的百姓生计，已不可详考。但历史中偶尔透露的事实，已经让现代人惊心动魄哩。

“从来旱蝗两相资”

商汤时代，已有民无廉而卖子女的记录：公元前28年首见“民食榆皮”；“人民相食”自公元109年始见于《后汉书》。随后有“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经日而死者无降”、“……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百姓或饿死，如公元946年，“曹州奏，部民相次饿死凡三千人”；或逃荒，公元166年(后汉延熹九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或揭竿而起，逼上梁山，早期如公元23年，因旱蝗“贼盗群起，四方溃畔”、“……沂、密、兖、郛，寇盗群起”。

类似事情史不绝书，到后来基本成为一种模式，而且时代越往后，灾越重，破坏性越大。崇祯大旱及后来的战争，全国人口剧烈减少；1927年大旱，引发山东民众背乡离井“闯关东”，当时政府限制逃难，凭证件卖火车票，许多人沿铁路步行。

丹江口水库——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它位于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处的河南南阳淅川县。这里也是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

□1977年夏，淅川县一连数月滴雨不见，庄稼枯萎，田地干裂。这已经是南阳地区持续干旱的第三年。这年秋天，严重的旱情使淅川县的丹江口水库极度枯竭，甚至连淹没多年的龙南山山脊都露出了库区的水面。

有一天，淅川县仓房公社的两个渔民正在龙南山端的水库岸边像平常一样撒网捕鱼，当渔民开始慢慢收网时，鱼网突然变得出奇地沉重。当两个渔民费尽全力将鱼网小心翼翼地拉上小船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把他们惊呆了：渔网拉上来的居然是一兜黑乎乎的铜器。其中，有铜簋、铜壶、铜盘……

□位于河南南阳西南角的淅川县南部与湖北省相邻，向西和陕西省接壤，北依伏牛山，向东可以俯瞰南阳盆地，丹江和浙水南北贯穿全境。古文献中所说的“丹淅之地”就是这里。

淅川楚墓



王子午升鼎出土



和尚岭克黄升鼎



云纹铜禁

又在下寺龙南山南端意外地发现了一座被水不断冲刷且破坏严重的古墓，并在岸边水中捡到了一些青铜器和玉器。颇具文物保护意识的公社领导，一方面把这一情况马上汇报给了县里的文管会，一方面派有关人员前往墓地收集散落文物，并指定专人保护岸边现场。

器物达6098件，仅带有铭文的器物就多达69件。在M2号墓中，一套形制相同、大小递减的青铜鼎更是令人激动不已。因为，这些鼎内的铭文都涉及“王子午”三个字。铭文中全面记录了王子午一生的功德，大意为：楚康王某年元月丁亥这一天，王子午选择了精美的黄铜，铸造了礼器升鼎，用来祭祀祖先文王，用来乞求长寿。

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楚国始都丹阳城究竟在何处呢？当淅川下寺楚墓群被发现，众多的楚墓、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里是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楚国最初的封地丹阳。

□这一年，淅川下寺古墓群居然发掘，清理出了数以千计的楚国文物。特别是其中一个编号为M2号墓的发掘结果，更是令考古人员叹为观止。

□就在淅川下寺古墓群发掘10年后的1989年秋，丹江口水库再度因干旱大面积缩减水面，水位大幅下降，距下寺墓区不远的一些古墓葬又一次神秘地露出了水面。

特别在枯水期，暴露出的古墓轮廓十分清晰，随处可见。在文物贩子高价收购文物的诱惑下，一时间，仓房一带盗墓成风。抢救发掘已刻不容缓。1990年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了省、地、县三级联合文物考古队在这片墓区进行抢救性发掘。

□就在淅川下寺楚墓群发掘10年后的1989年秋，丹江口水库再度因干旱大面积缩减水面，水位大幅下降，距下寺墓区不远的一些古墓葬又一次神秘地露出了水面。

相关链接

历史上的山东重大旱灾

自1264年以后，旱灾的记载增多。1264年-1367年(元朝)的104年间，山东共发生旱灾32次；1368年-1643年(明朝)的276年中，山东共发生旱灾167次；1644年-1911年(清朝)的268年中，山东共发生旱灾243次。重大旱灾记述如下：1637年-1641年，崇祯大旱——山东发生特大连续旱灾。1637年，有10多个州县志中有“夏旱无麦”与“大旱米饥”的记载。1638年又连续发生了大旱的蝗灾，“春大旱，井泉大竭，黄风时作，飞沙满天(郛城最甚)”，“春大旱蝗落处树摧屋损，四月二十九日始雨”，“七月夏蝗”。1639年，又继续发生大旱和蝗灾。《益都县志》等记载：“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大蝗，岁大饥，人相食，流民载道。”“夏四月蝗输入城如流滴，秋大旱，狼入村镇，夺人畜。”到1640年，又发展为全省性特大旱灾，有48个州县记载“人相食”，如“春不雨，六月限霜，十月斗米二千，井泉涸竭，芽花不开，果不实，牛羊不孕，鸡鸭不卵，妇人不孕，冬，人相食”(《菏泽县志》)；“春夏大旱，百日风霜，秋无禾，斗米一两二钱，民间食草子树皮为生，有父子兄弟夫妇相食者，惨状难悉，饥民为盗，蜂起焚掠，四境萧然”(《莘县志》)……这次特大旱灾一直持续到1641年，旱灾加虫灾，无麦无秋，“树皮皆尽发瘁而食”，饥民“劫四境，杀戮甚惨”。

然给发掘者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墓中出土的两件升鼎的底部刻有四字铭文——“克黄之升”，“之升”表明这个鼎是升鼎，那么“克黄”是谁呢？与此同时，又一个关键证据意外地出现了。原来，淅川县公安部门在打击盗掘活动时收缴的文物中，有属于这个墓所出的鼎、方壶等。其中两件方壶上同样铸有“克黄”字样，这为进一步证明墓主是克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不久，经过古文字专家对铭文的解读，原来，这里真的埋藏着众多的楚国王族显贵。《左传》记载过一个叫箴尹克黄的人。“箴尹”用现在来说相当于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古代封建社会叫谏官。而这个官名叫克黄。从这个墓出土的“克黄之升”和“克黄之壶”，应铸造于公元前605年前，这个时代为春秋中期。所以，专家以此来判断克黄升鼎是目前发现的楚国最早的升鼎。王子午和克黄都是楚国高级贵族，都担任过重要官职，他们的墓葬相距不过区区四百米！这么小的区域绝对不可能是两大贵族的封地。

